

回顾与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出卖 苏维埃帝国

*THE SELLING OF
THE SOVIET EMPIRE*

[俄] 阿尔弗雷德·科赫 博士 著

Alfred Kokh, Ph.D.

裘因 邹用九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出卖苏维埃帝国

[俄] 阿尔弗雷德·科赫博士 著

裘因 邹用九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卖苏维埃帝国/ (俄) 科赫博士著; 裘因、邹用九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12

(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内部发行

ISBN 7-5011-4743-4

I. 出… II. ①科… ②裘… ③邹… III. F151.21 IV.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236 号

The Selling of the Soviet Empire

Copyright © 1998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出卖苏维埃帝国

(俄) 阿尔弗雷德·科赫 著

裘因 邹用九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40,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43-4/D·752 定价: 15.00 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致 谢

本书是我的忠诚的同事们和我本人在 1992 年至 1997 年底这一个时期中所进行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的成果。

我特别要感谢阿纳托利·丘拜斯、彼得·莫斯托沃依和季米特里·瓦西里耶夫，他们是俄国私有化过程最早的发起者。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马莉娜在我们生活中如此困难的时期中表现出的无限的爱和热诚。

阿尔弗雷德·科赫
1998 年 5 月于纽约

“别去审判别人，这样你也不会受到审判。”

——《马太福音·七章一节》

献给万里·斯库拉托夫，俄国的检察长，要不是他的干预，这本书只能被人看成一篇经济论文！

前 言

没有一本书能跟得上俄罗斯联邦的形势。因此，本作者必须再写一篇前言来帮助您理解本书以及在该书创作过程中政治方面的来龙去脉。它也将向您介绍本书写成以来的事态发展。例如，在本书正要付印之际，所谓的寡头之战（亦称银行家之战）逐步升级，结果形成了深刻的政治危机，导致政府于 1998 年 3 月彻底解体。当时我于 3 月末撰写这篇前言时，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已被迫辞职，不久前还担任燃料动力部部长的 35 岁的谢尔盖·基里延科受命组织新内阁。

我想，读者对我的期望是能从银行家之战的战场上写出耸人听闻的报导，以及有关其主要人物的真实情况。这种推断是合理的，因此让我来简要地谈一下，是什么情况——据我所知——促成了这场战争，什么事导致了它的后果。（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对其后果是否能持久，没有把握，因为敌视行为可能为了争夺别的东西

以另一种形式再次爆发。)

不久以前，最后几家国营石油公司当中的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全部股票被交付拍卖了。据德累斯顿·克莱因沃特·本森的估计，75% + 1 的股票总额开价为 21 亿美元。我认为，宣布拍卖和与之同时宣告解散的政府之间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举行这样的拍卖，没有一个银行集团能直接从中获利；它们承认，21 亿美元的起价是很高的。任何有关这种价格能使什么人获利的议论，至少是愚蠢的。等到尘埃落定，才能弄清楚，谁是施主，但目前要做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另一方面，我猜想，如果进行了拍卖，而交战方无法筹到这笔款子，那就可能在传媒界的战争中出现新的震荡，爆发新的战斗。

至于银行家之战，有些人认为，这是由出售 25% 通讯投资股票的拍卖造成的。我不同意，因为我认为拍卖是令那些最大的银行集团丧失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对那些以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米哈依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梅纳特帕一万科斯公司为首的银行集团，也许还有西伯利亚农业银行，更是如此。他们觉得，拍卖的结果将他们排挤出局了，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认为，私有化的俄国大公司会按照“公平”的条件加以“瓜分”，而不会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也许这是我们的错误，政府的错误，我

们未能让他们知晓此中究竟。由于许多客观原因，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公平的”条件。主要的原因是，即使有条件，这种“瓜分”也根本不利于、永远不会有利于政府。在 1997 年春季和夏季，从私有化获得的收益是预算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钱是解决总统决定的许多问题，首先是归还亏欠预算中的个人和军队的债务所必需的。我们必须以尽量高的价格出售通讯投资，正如我们以前必须出售其他私有化的项目一样。

有人会说，其他的拍卖以前都是以“瓜分”的形式进行的。实际上这并不确切。如果我们考查一下在通讯投资前后进行的大拍卖，我们只能看到两种拍卖的形式：

一种形式是在信贷银行安排的抵押拍卖基础上的出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没有什么发言权。尤其是 1997 年 5 月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 51% 的股票总额的拍卖，是由掌握着抵押品的石油融资公司进行的。政府无法左右这场拍卖。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总归是发生了。当然，并不是皆大欢喜，据我所知，诉讼仍在继续。然而，早在 1995 年，政府就作出保证，这些拍卖将交由抵押股票的一方进行。诺里尔斯克镍矿的情况也是如此。

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对这两次拍卖的批评是毫无理由的。任何关于这些拍卖缺乏公开性的批评，实际

上是在批评抵押拍卖。与此同时，无论哪一个交战方都从未批评过抵押拍卖；相反，他们一向认为，这样的拍卖是一种建设性的开发。我同意这种观点。

至于 1997 年的其他几次拍卖——通讯投资、东方石油公司和秋明石油公司——与传媒界的断言相反，政府从未给任何一个银行提供优惠，也不曾答应由它们来主持这些拍卖。这些拍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出售的股票获取最高的价格。（很成功的一次拍卖的例子，就是 1997 年 12 月大规模专项出售东方石油公司的股票。得胜者俄罗斯工业—尤科斯集团，最后付出 5 万亿卢布，买进了 42% 的股票，这是我们当时能获得的最高价。）

这一切都表明，有关通讯投资的指责是荒谬的。因为人们也可以就东方石油公司、秋明石油公司和其他的任何一次拍卖来批评我们。其中没有一次是涉及“瓜分”的。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交易，因为这不是政府所需要的。再说，我们急需为预算提供资金。

尽管我不大了解其中的原委，但是还有人在不断指责通讯投资。我绝对不同意这样的指责，说我们将通讯投资“交给了”欧奈科斯姆^① 银行集团，从而加强了它的实力。胜者付出了实价，而败者出价比较低。事实上，没有人对程序提出抱怨。

^① UNEXIM：原意为联合进出口银行。

另一种舆论是，这么巨大的国家资产的拍卖不应该建立在最高的股票价格的基础上。提出这些指责的人认为，目前存在着一个银行界，它是由某一个多边的内部协议控制着的，只要将天平偏向于其中的一方——即使它们有资金——也会对竞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只关心它的收入，也应该关心结构问题，尤其是在购进了通讯投资之后，欧奈科斯姆集团变得过分强大了。据说，这次出售本应该有另一种安排，让这宗股票为另一个财团获得，现在那个财团当然认为自己是受骗上当了。

我认为，这儿有某种虚假的成分。为辨明究竟，让我们假设，高昂的股票价格确实不应该是惟一的标准，那么，在梅纳特帕集团通过尤科斯购得东方石油公司的控制股权时，这些批评家在哪里呢？如果当时是欧奈科斯姆买下了，一定又会对它的发展喧闹一阵。可是购得东方石油公司大大地增强了梅纳特帕的实力，尤其是在几个月前尤科斯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成尤克西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实际上，传媒界对这个石油巨头的产生是欢迎的。

最后，还有一个论点，从未明说，但是一直存在。有些人，特别是“桥”银行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手下的财团，在1996年的选举中，对叶利钦有很大帮助，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得到某种补偿——具体地说，就是

“通讯投资”。一旦他们没得到，就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了，因而就大造舆论。我觉得，这种做法根本是不正确的。

“先生们！”我会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当时确实曾为反对俄国共产主义，为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而战，那么，你们是在为自己的金钱战斗，要是共产党的候选人根纳季·久加诺夫获胜，你们的钱就会化成灰烬。这是你们支持叶利钦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因为你们想得到补偿！最最重要的，你们是在保护你们自己，保护你们的生意和生命——其次才是叶利钦和他的政府。”

（附带说一句，“石油工业”对竞选的贡献同任何人一样多，可是从未要求过任何补偿。）

为了让别列佐夫斯基先生能帮助总统赢得那次选举，他获准通过他的手下购得了俄罗斯公共电视台，这也不是秘密了。难道这样的补偿还不够吗？

总之，我认为，我们的反对派所提出的有关银行家之战的根源的这些解释都不具有说服力。我觉得，原因只有一个，而且很简单：

请设想一下，有一群企业家，大家处于相同的地位，手中的资本也相差无几。砰！起跑的枪声响了，他们就朝着私有化的五彩缤纷的新世界奋力跑去。有些企业家开始买进工厂，投资在工业部门。另外一些人宁愿

将他们的资金用于建立传媒帝国，以便垄断广播，这样就可以左右舆论，迫使政府对他们提供特别的保护。现在，如果政府没有这么做，传媒界就要对政府中最“不听话的”代表进行诋毁。然后，这些企业家就会操纵这一“传媒棍棒”，开始用低价在其他领域进行投资，或者他们会开始猎取工业部门，不是通过购买公司或公司股票，而是强行任命人们的自己人参加各董事会。

我觉得，政府忽视了这种传媒垄断，还以为我们的传媒是多元化的，足以客观地反映俄国的经济和政治，这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种垄断形成以后，就产生了一股真正的势力，它能挑起全国的政治危机，并迫使政府要么采取某些行动，要么就辞职。

1997年夏天的情势就是这样的。当时我们面前摆着一份明确的最后通牒：“除非禁止欧奈科斯姆参加‘通讯投资’，否则我们就要发动一场传媒界的运动，我们将赢得这次运动，因为我们掌握着这么做的手段，而你们没有。我们能制造舆论，开创局面，抛出能击中要害的证据，我们能影响选举和杜马，并制造危机。”我认为，政府没有屈服于这一要挟，是完全正确的，不过，现在我们却要应付它的后果了。

从另一方面说，正是由于这样的拒绝，我们才能正常地拍卖东方石油公司，也就是说，没有人对实行的规则表示惊讶，更进一步说，对“俄罗斯石油”的拍卖才

能以绝对公开、毫不妥协的形式进行。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必须再一次强调，当时政府没有选择的余地：屈服于要挟，只会进一步刺激传媒巨头的胃口。如果投降，他们就会以为：

一、他们的投资政策是正确的；

二、通过传媒界来左右政府，是猎取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的有效办法；

三、投资于工业生产的人们是做错了。

我认为，我们还未能切实了解俄国最近的政治危机。我也不相信，我们异常坚定，足以在今后顶住这种要挟。然而我确信，如果允许传媒垄断组织完好无损地继续存在，俄国的政治危机就会像瑞士钟表的运转那样，有规律地、一成不变地重复发生。当然，政府可以就此停止出售资产，完全放弃私有化。我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正如我一再说的那样，国家是效率最低的老板；许多研究报告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西方读者更需要更多的论证。

最近的俄国危机的另一个值得强调的重要特点，是我们的政治机构缺乏内聚力。不知怎的，我们许多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活动家，包括部长们，都决定从一个集团转向另一个集团来延长他们的政治生命。也许，前内务部长阿纳托利·库利科夫积极地支持银行和传媒巨头一方，并不是自愿的。据我所知，他们答应给他一些好

处，例如让他在传媒界的形象不致遭到玷污等等。然而，也就是由于这些巨头的努力，他丢掉了工作。也许，他当时要是参与政府这一方，情况会好一些；这本该帮助我们更加不屈不挠地执行我们的政策，并且向寡头们表明，不可能在传媒界的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妥协。

库利科夫的事件，对即将任命的新内阁来说，是个很好的教训。他们会懂得，对这种人采取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取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性邪恶或者倾向凶暴。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同传媒巨头的妥协之所以是不可能的，在于他们的投资在战略上的先决条件就是通过在传媒界对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如果这样达不到目的，不能为巨头们赢得好处，那么为建立他们的帝国所投入的资金就会浪费。这些巨头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这会导致他们的破产。他们将资金投入了一个不起作用的工具。现在他们觉得人们必须让它起作用，惟一的办法就是挑起政治危机，导致整个内阁的解体。1998年3月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

那次的解体是“通讯投资”结算后爆发的政治危机的必然后果。政府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在市场经济的机制下管理国家。像俄国这样错综复杂的国家，只能由一支行动协调一致的班子来管理，一旦做不到这一点，政府就会停止执行其职能，变得毫无用处。我不赞成一般的联合政府，因为只有在政府的作用极小的国家里才是可

能的。在那里，经济是由市场那无形的手控制着的，与政府无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像联合政府这样的妥协解决的方法才是可行的，即使如此，实际上它还会是无法运转的。例子很多；一个是意大利，在那里，眼睛一转，内阁就换了。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英国，也从未有过联合，那里都是由执政党组阁的；实际上德国也没有。即使是在他们的议会制度下，也很难想像一个既包括基督教民主党人，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的政府。

过渡时期的经济需要认真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是要由一个强大的权威执行机构来贯彻的。在这种时期，联合政府当然是无法运作的。这就是我们拒绝在俄国建立联合政府的原因。惟一的选择是一个能像一个协作的班子那样工作的政府。这是能够实行改革的惟一的一种政府。叶利钦总统在 1997 年 3 月组成的政府，包括了我本人，（更重要的）还有阿纳托利·丘拜斯和鲍里斯·涅姆佐夫，一直到夏天，也就是说，一直到拍卖“通讯投资”之前，我们相互之间都配合得很好。我们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并且达到了这些目标：我们支付了养老金，军人的薪金，最后，到 1998 年 1 月，我们付清了所有预算中列入的工人的工资。

传媒界开始对政府施加压力，对有些成员进行诋毁，对另一些成员频送秋波，这时作为一个协作班子的政府就不复存在了。总统正确地指出，政府已不能完成

其工作了，它已不能推行改革，为经济增长而工作，等等。第一次，叶利钦是在一月份说的，然后，在2月他又重复了一遍，到了3月他就放弃了。他说，如果你们再斗下去，如果你们互不信任，如果你们不再合作，就要解散你们。第一个卸任的是总理，他让事态放任自流，结果政府不再是一个协同作战的整体，出现互相争斗的两派：阿纳托利·库利科夫派和阿纳托利·丘拜斯派。

这两派人显然代表两种不同的政策。丘拜斯及其支持者所谓的年轻改革者，他们认为，要解决俄国的问题，就要走结构改革的道路：我们必须改变资产的形式并组建大型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应该取消对这些公司的专卖权；我们应该放宽对价格的控制，尤其是住房价格。而库利科夫派则认为，我们不需要彻底变革，这种变革是有害的，将导致社会的犯罪化；经济的私有化会造成高犯罪率；整顿经济的惟一途径是重新对经济进行集权控制。库利科夫整治经济的方案是众所周知的，主要是通过他自己的讲话——将银行和大公司等收归国有。

正如我已指出的，谢尔盖·基里延科受命组织新的内阁。我认为，如果传媒界停止对政府施加压力，这一届内阁是能够协调工作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将再次面临瓦解和混乱。因此，为了保护自己不再遭到解

体，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取消对传媒手段的垄断。

让我们实话实说吧。70%俄国传媒界是由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控制的。印刷品对舆论的影响要比电台和电视小得多；我主要谈的是电视频道。三个全国性的频道中，一频道（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四频道（全国电视台）是属于这两位先生的。古辛斯基拥有全国电视台的全部股权。至于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国家掌握着控制股权。但是实际上，它是属于别列佐夫斯基的。不难想象，一个人拥有如此巨大的潜力，能干出什么事来。国有的俄罗斯频道太弱了，无法与其他两家的新闻部门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两个人控制了70%的传媒工具。这并不是说，人民没有能力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俄国政治机构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政策制定者，而不是单纯的旁观者——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能顶得住这些人的压力。一下子，他们就能编造出一个受贿者、一个色鬼、一个公众的头号敌人的卡通形象。在今日的世界，有了这样的形象，一个人是无法长期维持他的政治生命的，如果你想留在俄国政界的奥林匹斯山顶上，那是不行的。

我觉得，俄国正面临着一种选择。一种办法是容忍传媒界的专政，间接地表明，这些巨头的投资战略是正确的，他们可以无休止地要挟政府。我认为这种战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将导致激烈的政治动荡和全面的对